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29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法)莫兰著.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

(埃德加·莫兰著作译丛)

ISBN 7-301-04374-0

I.迷… II.①莫… ②陈… III.人性-研究 IV.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4234 号

书 名: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

著作责任者:[法]埃德加·莫兰 著 陈一壮 译

责任编辑:袁玉敏 张 冰

标准书号:ISBN 7-301-04374-0/B·0184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36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72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4.00 元

我看到人这种动物，不如某些动物强壮，也不如另一些动物敏捷，但总起来说，他的构造却比一切动物都要完善。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宇宙的历史	70 亿年
地球的历史	50 亿年
生命的历史	25 亿年
脊椎动物的历史	6 亿年
爬行动物的历史	3 亿年
哺乳动物的历史	2 亿年
类人猿的历史	1 千万年
原人(Hominiens)的历史	4 百万年
智人(Homo Sapiens)的历史	5—10 万年
城市、国家的历史	10,000 年
哲学的历史	2,500 年
关于人的科学的历史	0 年

总序

东方和西方的交融

当我为我的主要著作《方法》^①一书的总导言做结语时，我引用了《道德经》中称呼“道”所用的“谷神”^②一词以宣扬“道”的“吸纳百川”的精神，这难道纯属偶然吗？当我从旨在把分离的东西联系起来“复杂性原则”出发来定义“方法”一词时，我讲到在西方语言中该词的最初含义意味着“行进”，同时我又一次提及东方的“道”——具有“道路”的意思并是统一阴和阳的原则，这难道纯属偶然吗？

我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了解是非常片段的，得自于对翻译著作的阅读。我自己的思想方式是受西方少数派的思想传统滋养的，这个思想传统由赫拉克利特、尼古拉·德·库萨^③、帕斯卡、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所标志着。但是我感到我的思想方式与中国传统所固有的深刻的思想方式处于共鸣之中。我认为从复杂方法中可

① 《方法》(La méthode)是莫兰的多卷本巨著，由法国色伊(Seuil)出版社出版，迄今已出四卷：1.《自然之自然》(1977)，2.《生命之生命》(1980)，3.《认识之认识》(1986)，4.《思想观念》(1991)，其中1、4两卷的中译本已收入本译丛。

② “谷神”，见《老子道德经》第六章，法文版中译为“山谷的精神”。——译者注

③ 尼古拉·德·库萨(Nicolas de Cusa, 1401—1464)：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哲学家，西方某些学者认为他是黑格尔的前驱。——译者注

以归结出的两个基本原则——两重性逻辑(dialogue)的原则和回归环路的原则——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们以其他词语所做的同样的表述。因此表明对立的原则和概念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互补地联系着的,而且它们在这种互补联系中仍保持着彼此对立性的两重性逻辑的原则,实质上不仅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修正性的发展,而且可以看作是对从老子到方以智^①的中国思想家的一个关键思想的现代、西方式的表述。

同样,在本“译丛”所收入的著作中,我阐释并运用来理解宇宙中和宇宙本身的自我创造和自我产生的过程的“回归的环路”这一原则,与在方以智那里得到充分表述的“道”的一个深藏的主题也是彼此相应的。

此外,当我在努力寻求一种不是以孤立和封闭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而是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来把握对象的认识方法的时候,我总是自然地感到与中国的注重联系、变动和转化的思想相沟通。我甚至可以用庄子的话做我许多著作的引言:“大知闲闲,小知间间”;^②当然“大知”需要和包含着“小知”。在此,我们与指导我的帕斯卡的原则会合了:

所有的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我认

^① 作者在本序中一再提到中国 17 世纪的杰出思想家方以智(1611—1671)。这与他仔细阅读过本文译者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答辩通过的关于中西辩证法比较的博士论文有关。该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是黑格尔和方以智辩证法思想的比较研究。其缩写在国内发表于《中国哲学》杂志第 18 辑(岳麓书社,1998 年 9 月)。——译者注

^② 语见《庄子》第 2 篇《齐物论》,意为大的智慧宽容广纳,小的智慧务求精细的区分和取舍。——译者注

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

因此我非常高兴看到我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我相信尽管有着词语的不同，中国读者会比许多西方读者更易于理解我，因为这些西方读者忠于笛卡尔的分离和区别的原则远胜于忠于帕斯卡的联接和相互作用的原则。

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几乎是零。在这方面我只是阅读过长篇小说《水浒传》，但是感到一种精神上高度的满足。我一边读，一边不停地思量：“他们与我们多么相似！”“他们与我们多么不同！”

正是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这种统一性中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精神的财富。它认证了我们的地球公民籍，同时又包含着我们各自民族的公民籍而不使之变性。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的是1992年我应邀访问中国，我曾经既沉浸在西安数千年的古史中，又漫步于上海、深圳和广州这些未来时代的前沿阵地。我感到与人类这个巨大部分感人的命运相通，它的文明诞生于人类历史公元的初期，而今又迎击着全球时代的所有挑战。

作为一个十分遥远而又十分亲近的朋友，我向你们献上这些话，你们将在这个朋友的书里既发现距离又发现相通之处。

埃德加·莫兰

1999年7月5日于巴黎

前 言

这本书对我来说既是一个转折点同时又是相对于出发点的回归。因为虽然其理论研究的方法是崭新的,但它所探讨的问题却是最早萦绕我心头的。在1948至1950年撰写的《人和死亡》一书里,我探求生物学和人类科学的连接点和断开点。当时我写道:“我们关于死亡这个主题的人类学研究,目前是建立在史前史、人种学、历史学、社会学、儿童心理学和一般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它想使自己成为真正科学的认识,现在必须再提出生物学方面的论据。”

我毫无自封为具有特别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之人的意思。我认为我在年轻时只是曾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年介7岁和17岁之间的年轻人都会向自己提出的天真、平凡和明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他们进入大学和接受一些权威学说教育时起就被阻止、压抑、窒息和丑化了。我则在兴趣的推动下进行自学,也就是说不让自己过分地被学校的教条和“精神权威”们的尊严所吓倒,我不禁考察了正统人类学认为已经完满解决了的问题。而现况是:关于人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建立在人的概念和动物的概念、文化的概念和自然的概念不仅分离而且对立的基础上的;所有不符合这个认识范式的理论都被斥为“生物学主义”、“自然主义”和“进化论主义”。

在自我肯定之后,我应该作自我批评,因为从那以后约20年之久,让这个基本问题在我身上沉睡了。当然,我从来没有把人看作一个封闭的、脱离于自然并和自然格格不入的实体。在1962年

我重新询问：“我们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意味着什么？”（见《主体的焦点》一书）还尝试提出了一个“人类—宇宙论”。但是，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我当时不仅缺少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环节，而且还缺少许多基础因素来支撑这个探索。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把自己关闭在一个狭小的人类科学的笼子里。而随着我愈益接近问题的中心，我就愈益远离我所具有的知识的框框和文化的狭小眼界。在同一时期写的《为人的政治的导论》这本书中，生物—人类学的问题一再出现，但是以突发的、片段的、肤浅的方式出现的：一会儿是为了考察科学活动是“人类的内在活力的产物”，“在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进步与这个进化相互影响，给它确定发展方向并改变它”；一会儿是为了提出一门“生物—政治学”的必要性；一会儿是出于对“人性”在继续演变的过程中产生更高级的人类的向往。

总之，我对生物学的关心曾经一度变得模糊、淡薄了。如果没有在1968年半偶然地发生的一系列震撼性的事件唤醒和滋长了我的头等疑问，它可能还要进一步削弱。当时我敏捷地抓住了两次偶然出现的机会，它们成为我重返有关研究的契机。

1968年，雅克·罗宾(Jacques Robin)医生组织了一个主要由生物学家和控制论学家组成的交流思想和讨论问题的小组，我也被邀请参加(即“十人团”)。在小组里，罗宾坚持不懈地指导我阅读新的资料，雅克·索文(Jacques Sauvan)和亨利·拉勃利特(Henri Laborit)则帮助我发现控制论远不是机械式化简的认识模式(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相反地是通向复杂性研究的阶梯。

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一年以后。当时由于约翰·亨特(John Hunt)和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的介绍，我被美国生物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邀请访问萨尔克生物学研究所。人们要求我做的惟一事情也就是我惟一希望做的事情是：学习。在那里我重新变成学生，以无比的乐趣，任凭我的探索按着好奇心的逻辑

而驰骋。在那里进行的阅读(包括对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手稿的阅读),与愿意做我良师的研究所研究人员的交谈,不是加速了我“向生物学的转向”,而是加速了我整个理论思想的再定向。在同一时期,美国圣迭戈大学通讯系的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 Wilden)帮助我发现了美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研究成果,并促使我去探察在“一般系统论”的名义下汇合起来的各种思潮。也是在同一时期,生态学的问题从四面八方向我扑过来。当时威尔登正在进行他的“生物系统学”的研究,而埃莱娜·迪尔宾让我在巴克莱结识了许多新的生态学思想的开拓者和斗士。

在这个进步的基础上,返回法国之后我又接受了决定性的激励:我在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的《生物的逻辑》一书中看到了生物学概念发展的令人惊异的辩证法,而亨利·阿特朗(Henri Atlan)使我对约翰·冯·诺依曼的自动机理论入了门并开始掌握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来自噪音的有序”,亦即“起组织作用的无序”这一原则。我利用在蒙特利尔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一次逗留,沉浸到三部当时在法国找不到的关于“自组织系统”的著作中,其中戈塔·根室(Gottard Gunther)的阐述令我赞叹不已。我继续放弃过去所学的一切并重新学习一切,终于实现了我在《主体的焦点》一书中误以为当时已经达到的对我思想系统的整个基础的批判性改造。

从那时起,我从在极其不同的学科领域里找到的材料出发,从一些仍处于传统学科的边界线上的(由于缺乏过境签证而被海关扣留)关键思想出发,摸摸索索地、试探地、不确定地构筑新的理论。我不敢确定我构筑的理论,“回答”了我认为现在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但是它至少反映了这些问题。这个工作还远未结束,在一部未来的著作(《方法》)中我将对它做第一次全面表述。

这项研究的开展与 GIEBAF(生物—人类学和基础人类学研

究国际中心)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我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归来之后,就渴望有一个适宜致力于研究有关问题的中心,在那里人们不仅可以进行生物科学和人类科学之间的学科交流,而且获得和展开真正的超学科的思想。我的想法被鲁瓦约蒙人类科学进步基金会接受并采纳到它的计划中。从这时起,导致本书的研究工作与 GIEBAF 的活动交织在一起。^① 在 1971—1972 年,我与分子生物学家马西莫·皮亚特里-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一起,用一系列阅读、对话、研讨会的形式组织了一次学术探讨活动。我从这次探讨中得到了异常丰富的收获,它在未曾意料到的许多问题上揭示出我的无知,给我指引方向,推动我重新学习。

这次探讨活动以一次大型讨论会为结束。40 多位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会集在鲁瓦约蒙中心共同阐述“人的统一性”这个主题。赛勒斯·伊顿[帕格沃什(Pugwach)运动的捐助者]的慷慨资助使 CIEBAF 有可能邀请到这些客人。这一次,又是雅克·莫诺牵了线,因为赛勒斯·伊顿原来允诺向《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的作者提供举行一次国际会议的条件。

本书是这次讨论会的产物。起初我只是想做一个长 15 页左右的报告,结果我竟写了 70 页。于是我明白了:事实上,不知不觉地,在这个既是太长又是太短的草稿的形式下,一本书的胎儿已经在我身上形成,并要求着它的完成。它的圆满完成是由讨论会本身助成的。读者将会从书中所作的大量引证中看到:虽然我的著作变得独立成篇了,但它与汇集了关于“人的统一性”问题的报告和讨论的会议录^② 仍然是相互补充的。

① CIEBAF 也转变成了鲁瓦约蒙人类科学中心(1972—1978)。

② E. 莫兰和 M. 皮亚特里-帕尔马里尼主编《人的统一性》,巴黎色伊(Seuil)出版社,1974 年新版三卷集,收于“观点”丛书。

目 录

总序：东方和西方的交融	埃德加·莫兰(1)
前言	(5)
第一章 认识论的接合	(1)
一、封闭的科学	(3)
二、“生物学革命”	(8)
三、“我们的低等兄弟”	(19)
四、缺口和接合	(34)
第二章 从原人向智人的进化(人类社会的产生)	(39)
一、被捕猎者掌握了捕猎	(41)
二、古社会形成史	(51)
三、原人进化的关键问题	(67)
四、最终的未完成状态	(75)
第三章 赋有疯狂性的动物	(79)
一、智人一狂徒	(81)
二、超级复杂性	(98)
三、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	(116)

第四章 原始社会	(131)
一、社会的分叉和开放.....	(135)
二、文化.....	(144)
第五章 人类的第三次诞生：历史社会	(153)
一、庞然大物.....	(155)
二、历史.....	(162)
第六章 人的半岛似的概念	(171)

第一章

认识论的接合

一切都促使我结束关于一个非人类的自然和一个非自然的人类的观点。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

一、封闭的科学

贫乏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的动物。我们的身体是一部由三百亿个细胞组成的机器，它由一个遗传系统控制和再生，而这个遗传系统是在 20 到 30 亿年的漫长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用来思索的脑子、用来说话的嘴巴、用来写字的手都属于生物器官。但是这种知识是不充分的，如同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由碳、氢、氧和氮的元素的化合物组成的一样。

从达尔文开始，我们承认我们是灵长类动物的后代，但这决不是说我们本身是灵长类动物。我们相信：自从我们的祖先从曾经生活过的热带树上爬下来之后，我们就永远摆脱了林栖生活；我们在自然之外建立了独立的文化王国。

我们的命运明显地不同于动物的命运。后者包括灵长类动物，被我们驯养、约束、抑制，关闭在笼子或自然公园里。我们则用砖石和钢铁建造城市，发明机器，创造诗歌和交响乐，还到太空航行。这怎不令人相信：虽然我们源于自然，但以后不是处于自然和超于自然了吗？从笛卡尔开始，我们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思考，确信我们的使命是统治、控制、征服自然。基督教是这样一种人的宗教，他的超自然的死亡使他摆脱一切生物的共同命运。人道主义是这样一种人的哲学，他的超自然的生存使他摆脱了一般生物的命运，成为一个客体世界中的主体，一个臣仆世界中的君主。此

外，虽然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种：“智人”，但是这个本性上的共同点不断被那些不承认异族人与自己有相似性的人加以否定，或者他们自认为独占了人的全部品质。甚至古希腊哲学家也把波斯人看成未开化的蛮族，把奴隶看成活工具。即使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是人，但马上我们就把那些被称之为“无人性的”家伙排除在外了。

总之，人性这个题目在历史上不断引起哲人的质询，从苏格拉底到蒙田和帕斯卡，不过都是为了揭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疑惑、矛盾、谬误。因此这个题目没有导致人们增长知识，而是导致了对已有认识的怀疑。最后，在雅克·卢梭的著作里，人性终于以圆满性、美德、真理、善良的面目出现，但这不过是为了接着说明这个美好的人性已被放逐，使我们为这个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乐园而悲叹。但随后无须花费很多时间就会发现这个乐园像另一个失去的乐园一样都是想象的。

帕斯卡找不到认识人性的完美范式，卢梭把人性比作失去的乐园；而随着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进化的和文明具有多样性，人性的概念更被摘去了核心而变成柔软的原浆。既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人类是如此不同，既然他们随着社会发生变化，那么人性就不过是一种可塑的原料，只有文化或历史才能赋予它形式。此外，在保守派把人性说成千古不变的东西以使用它来反对社会变革的条件下，进步的意识形态宣布：由于人类在变化，不需要有人性这个东西。从而美德、智慧、活力都被从人性的概念中掏空，使人性变成一个无定型的、惰性的、单调的渣滓。但这正是人类摆脱了的东西，而丝毫不是构成它的东西。

然而自然界不是包含着一个多样性的原则吗？这已被几百万个物种的存在所证实。它不是还包含着一个演变的原则吗？它不是包含着进化，而正是这个进化导致了人类的诞生吗？那么人的本性会不具备这些生物学性质吗？

封闭的范式

有人曾经相信只有把自然科学特有的数量化的研究方法和客观化的思维模式延伸到对人的研究上,才会打破人文科学的岛屿状态,把人重新整合到宇宙中去;关于超自然的人的哲学是人们最后的幻想之一,是抵抗关于人的科学的最后障碍之一。

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性。

但是在历史上肯定有过使人类科学扎根在自然基础上的理论尝试。在1844年手稿的充满智慧闪光的篇页上,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学的中心概念,不是社会的人或文化的人,而是“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远远没有把自然和人类对立起来。他提出:“自然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即人,是自然”。由此出发,他还提出了这个重大原则:“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人类科学,正像人类科学将包含自然科学一样:那时将只有一门科学。”恩格斯则努力把人纳入到“自然辩证法”之中。斯宾塞在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相似性的基础上建立他的社会学解释,以后人们以不同方式试图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发展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则在人的机体中寻找心理问题的根源,而他在性中找到了。但是斯宾塞的有机体主义不能走出平庸的类比之外,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变成了对自由竞争的粗劣的合理化。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初期的运动回流了,由于没有找到继续发展的土地而保持在无结果的状态,被人们归结为他们年轻时的失误。

本世纪前半叶的人类学确实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发展的,即坚决地断绝与“自然主义”的一切联系。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它们应该不仅从它们本身,而且从与既无精神又无社会的生物世界的对立中得到理解。

这样,虽然人是科学的对象,并被用其他科学所固有的方法来